

译介之旅

在翻译中与奥兹对话

□钟志清



钟志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博士,是第一位在以色列获希伯来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曾出版数部希伯来文学译著,译有《现代希伯来小说史》《地下室中的黑豹》《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等。

厅门口,排队等候。我经系里安排,在奥兹讲座后跟他到会客室交谈。我当时懵懵懂懂,拿着录音机要录下奥兹的话,奥兹摆摆手说,这次是个人交流,等将来专门做访谈时,我再允许你录音。那次,他不仅为我讲述了自幼受父母影响对遥远中国大陆的无限神往,而且谦和地为我纠正希伯来文的某些读法,并让我用中文读出一些人名和句子。也许正是因为那次交谈,我在日后翻译奥兹时,经常想到他说话的方式、口气乃至声音,并将这种口气与声音传达给中国读者。

后来,我成了奥兹的一名忠实读者与翻译:《我的米海尔》中那短促优美、充满张力的语言,《黑匣子》中那满蕴智慧的争论,曾令我如醉如痴,重新找回了少年时代读中国古典诗词的感觉。比其他奥兹译者幸运的是,我在2001年初到奥兹执教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学期时在奥兹的对面,同他的接触便多了起来。尤其在翻译《黑匣子》时,奥兹多次抽出上午授课前的一小时,在办公室为我解决翻译中的难点,我也曾应邀到坐落在内盖夫沙漠中阿拉德小镇的奥兹家中做客。那时,尽管我觉得奥兹和蔼可亲,是令人敬重的长者甚至朋友,但也确实觉得他深奥莫测。

真正在思想上走近奥兹,叩击他的心灵之门,是在翻译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时。这部近600页的作品的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展示出百余年间犹太家族历史与民族叙事,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蕴含着一个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作品中相互交织,使读者得以窥见其喜怒哀乐和得失荣辱。《爱与黑暗的故事》也是我迄今翻译的难度最大的作品,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我曾在2006年连续整整8个月,心无旁骛,终日伏案揣摩翻译,与人物一起欢笑,流泪,思考;有一段长时间,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顾不上洗脸,立刻冲向电脑,写下半梦半醒中苦苦斟酌出来的句子或词语。

在我刚刚从事翻译工作时,博士导师浦安迪便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文化。”对此我深有同感。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的修养、功力、才华、气质,乃至母体文化带入译本之中。2009年在以色列举行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奥兹的俄文译者指出,“每个人翻译出来的阿摩司·奥兹都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位译者的译作在不同文化语境和语言习惯中得到的反馈也不尽相同。记得2012年我在编校台湾版《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过程中,缪斯出版总编辑徐庆文女士曾提到译林版《爱与黑暗的故事》“文采优雅流畅”,所以仅仅主要修订一些台湾读者不习惯的用语、繁简转换造成的错别字、以及少数一些前后不一致的翻译名词,并补充一些注释”。此外,译林版出于某些考虑所做的删节也被台湾出版社编辑重新补译。但在阅读台湾版修改稿初稿时也对有些词语甚至句式的使用感到不太习惯。这种感觉,由王德威教授精辟地一语道破症结之所在:“每种中文文化传统均有其书写和阅读语言的方式”。同族语言尚且存在着沟通屏障,何况异族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

奥兹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其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他酷爱《圣经》中优美、简洁、凝练的词语,在许多作品中使用《圣经》中的暗示与隐喻,用简短促的句式形成强烈的抒情色彩,有些作品甚至以语言神韵见长。从语言构成上看,奥兹作品中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对话语言、叙述性语言和描述性语言。翻译对话语言相对容易,只要你能想象出主人公的说话情境,就可以翻译得妙趣横生。翻译叙述性语言,则需要仔细琢磨奥兹讲话的风格,同时借助“想象他者”的技能,想象奥兹讲话时的声音与情感,并把这种声音气质与情感特征传达给读者。最难翻译的要数描述性的语言,是对译者语言、学识、能力与耐力的全面考量。从语言特征上看,奥兹的语言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次。奥兹小说中的许多词语,本来在希伯来文中有意义,如《我的米海尔》中的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女主人公“汉娜”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Hag”,意为“节日”、“快乐”,这种神韵无论用英文还是用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让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我只好从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奥兹亦曾和我聊起如何把《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两个女传教士讲的《圣经》希伯来语翻译成中文以及某些长句子如何转换等。

经常有人尤其是以色列人,会问我:你是从英文还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奥兹。因为在他们看来,奥兹的希伯来语十分典雅,交织着多重含义,有时连本土以色列人理解起来都十分困难。坦白地说,我最初接触希伯来文本,只是把它当做结识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文学的手段,需要借助英文这根拐杖。加上以色列老师在教外国学生时,几乎不约而同把希伯来文

原文与英文译文加以比较。我在希伯来文学领域的启蒙老师考比博士曾对《我的米海尔》的英文译文大加赞赏,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原文更加纯熟,但已故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谢克德却持有异议,称奥兹的语言非常激越,具有音韵美,而德朗士在翻译中丢失了很多东西,英文本的节奏要平缓得多。它促使我在早期翻译《我的米海尔》的过程中,将1968年阿姆奥维德出版社的希伯来文版与1976年纽约矮脚鸡书系英文版逐字逐句对照,对比结果令我连连称叹,英文版确实十分精彩,在文法结构及用词上总体保留了原作风貌,只是个别章节有增译、漏译及句式变通的现象。渐渐地,比较译本成为我的职业习惯。随着多年翻译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在翻译《爱与黑暗的故事》时逐渐形成一个信念:忠实于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色彩与精神。

目前国内希伯来文学译者,多从英文、法文、德文等文字转译。尽管我赞同从希伯来文直译的主张,但个人认为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国内学界流行着大语种和小语种之说。在小语种中,希伯来语大概可以说是小中之小。言外之意,目前国内懂希伯来语的人数非常有限,而能够运用希伯来文进行文学翻译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为文学翻译不只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术性操作,而且需要译者具有较

高的文学素养、中文功底和翻译实践经验。希伯来文学作品的其他语种译者多是双重母语,甚至多重母语,他们对希伯来文的理解和把握往往超过后来从学的中国学者。从其他语种转译希伯来文学作品的诸多译者,一般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功底与翻译实践经验,其优势比较明显。因此,现阶段转译希伯来文学作品这项事业也应该得到鼓励。

记得多年前在《世界文学》做编辑时,一些前辈曾经讲过,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同大师对话。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才华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翻译过程本身便是与大师逐渐接近的愉悦过程,翻译奥兹确实是我的幸运。2007年奥兹访华时,我虽工作辛苦,但与奥兹夫妇在景山公园一展歌喉,在后海酒吧街把酒朗诵现代希伯来诗歌之父阿里克诗歌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奥兹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从1998年奥兹的长篇小说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迄今已经15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奥兹的一些长篇小说,如《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黑匣子》《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断再版。中国读者通过奥兹等希伯来语优秀作家的作品,对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社会有所认知。许多读者,包括中国作家对奥兹所倾注的热诚委实令人感动,甚至有时让人忘记了奥兹来自以色列——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语种国家。

译文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实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架梁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没有人穿的鞋子。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干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好意思地龇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话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要是他们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成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大声叫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如花瓶底下,留张字条。

我们都这样。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感觉细腻!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恨她。***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自己。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挟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再度自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而是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弄得太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来,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她对她的偏头痛倍加体谅。或至少,让她做点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

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还是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或者截然相反,要是我更加孱弱,患慢性病,坐在轮椅上,得了肺病,甚至天生失明……她善良慷慨的天性,当然不允许她抛弃这样一个残疾儿,抛下可怜的他,只愿自己消失。要是我是个没有双腿的瘸孩子,要是还有时间,我会跑到一辆奔驰的汽车底下,挨撞,截肢,也许我妈妈会充满怜悯,不会离开我,会留下来照顾我。

要是妈妈那样离开我,没回头看上我一眼,当然暗示出她从来就一点也没爱过我;要是你爱一个人,她这样教我,那么除了背叛,你可以宽恕她的一切,你甚至宽恕她唠唠叨叨,宽恕她丢了帽子,宽恕她把山珍海味丢在盘子里。

抛弃就是背叛。她——抛弃了我二人,爸爸和我。尽管她偏头痛,尽管现在方知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永远不会离她而去,尽管她长时间沉默寡言,把自己关闭在黑暗的房间,情绪失控,我永远不会那样离她而去。我有时会发脾气,也许甚至会一两天不和她说话,但是永远也不会抛弃她,永远不。

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那是自然法则。连一只猫儿一只山羊都是如此。连罪犯和刽子手的母亲都是如此。连纳粹们的妈妈都是如此。或者是弱智者的妈妈。甚至魔鬼的妈妈。只有我自己不能得到爱,我妈妈离我而去,这一事实表明我没有被人爱之处,我不值得爱。我有一些毛病,一些非常可怕,可憎,确实令人恐怖的东西,比某些生理或心理残缺甚至疯癫更加令人生厌。我有某种无法补救的令人生厌之处,如此可怕,就连妈妈那样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可以把爱慷慨施与一只鸟儿,一个乞丐或者是一条迷路的小狗,都无法再容忍我,躲我躲得越远越好。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对,“任何一只猴子在母亲眼里都是瞪瞎。”只有我除外。

要是我也可爱,至少一点点可爱,像世界上所有母亲眼中的孩子,甚至最丑、最淘气的孩子,甚至那些被逐出校门、有暴力倾向、心理不正常孩子,甚至用把菜刀把爷爷捅了的恶小子,甚至性变态狂,有象皮病,在大街上拉开拉链,拿出自己的物件给姑娘们看——要是我听话,要是我按照她叮叮呀呀嘱咐的那样去做,该多好,可我是个傻瓜不听话的……要是我在逾越夜晚睡觉后,我不把那只从她曾祖母那里传下来的蓝碗打破……要是我每天早晨好好刷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包括每个角落,不要花招……要是我不从她手里捏出半天冤枉,后又撒谎说我没有拿……要是我止住那些邪念,夜里没有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睡衣最里面……要是我像所有的人一样,也配有个妈妈就好了。

——钟志清译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

我译阿克梅派诗歌

□杨开显

大约20多年前,我读到一首诗:就让发达城市的名声,用短暂的影响愉悦听力。永垂不朽的不是罗马,而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帝王们企图把它统治,牧师们为战争寻找根据,没有人,房屋和祭坛,如肮脏垃圾,只遭鄙弃……

——《就让发达城市的名声》

这首诗在我的心中激起涟漪,让我感到些许激动。因为这是一首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经典的诗歌。诗的作者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代表诗人之一的曼德尔施塔姆。随后,我又读了他的一些诗,如《沉默》《当我们向上攀登》和《呼吸慌乱不安的树叶》等,这些清新、奇特、精致和优

美的诗作激发了我翻译曼德尔施塔姆以及其他阿克梅派代表诗人作品的念头。

1912年冬,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与另外几位诗人组成了阿克梅诗派。以古米廖夫为首的新诗派抛弃象征主义,返回“尘世”和“物质世界”;要推行清新明朗的诗风,以具体代替抽象,创造一种多色彩、形状和立体空间的诗境;要杜绝象征主义的比喻、暗示和模糊的语言,恢复语言的准确意义,追求雕塑式的艺术形象。这个流派虽也有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但一条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线贯穿在他们的创作走向中。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读者能比较容易地

读到阿克梅派代表诗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了。而我想翻译这些诗的念头在繁忙的工作中和译诗集极难出版的现实下被打消了。直到2011年秋,在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赵芳交流过程中,翻译阿克梅派诗选的念头才再次被激发。

我开始挑选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比较简短的抒情诗着手翻译起来。每晚10点多,我都准时向阿克梅派诗选这座高峰进发、攀登,“阿克梅”源自希腊语,就是“高峰”、“顶峰”之意。翻译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虽也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但不像以前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像是行走在峻峭山峦羊肠小道上那样艰辛。有时译笔走过,似乎能感到阿克梅派诗歌如潺潺泉水流过心田,或者像阵阵春风轻拂面庞。

古米廖夫是一个豪放而又不失婉约的歌者和强者。他的诗很多是书写战争、航海、探险、爱情、俄罗斯和异国风情的。在以强者形象出现时,他的诗歌富有激情,音调铿锵激越。翻译时,我希望让他崇尚强者的精神跃然纸上,而翻译他吟咏爱情的诗歌时,我注重呈现其中的缠绵悱恻、婉转动人。

而在译阿赫玛托娃时,会感到诗中有时流露出一种孤寂、凄凉、哀愁和遭遗弃的情绪,那是她一生几次不幸爱情生活的写照,令人同情。尽管如此,她的大多数诗歌表现的爱情仍然是真诚的、温馨的、无私的、心态平和和渴望高尚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当祖国遭受厄运时,阿赫玛托娃宁肯在敌土遭受磨难,也不流亡国外。她善良、高



尚、坚韧而富有同情心。我在研读阿赫玛托娃的诗时,感觉把原文的意思译出来相对容易,而要把一行行诗句所透出的这些气质用汉语表现出来,形成一种高雅的“气质场”却十分困难。而翻译曼德尔施塔姆时,通过对多首诗的研读,我深深体会到阿赫玛托娃把她喻为阿克梅派的“首席小提琴”并非溢美之词。越往下翻译,就越感到他的诗透出优雅的古典韵味,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他的诗行精巧别致,玲珑剔透,词句考究,音韵优美:

但愿我的嘴能获取/最原始的那种沉默,/犹如水晶般的音符,/一诞生就晶莹澄澈。/留下泡沫吧,爱与美的女神,/让词语返回到音乐,/让心愧于心,并且/与生命的大初融合。

——《沉默》

对精致物象的偏好,确实触发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灵感,也增加了他的诗的翻译难度。为了寻找一个“精美”的中文词或词组来对应他诗中的“精美”,我不得不苦思冥想多时,有时甚至达到

译文

呼吸慌乱不安的树叶
□曼德尔施塔姆
呼吸慌乱不安的树叶,
任黑风簌簌吹拂,
一只飞翔而过的燕子,
在阴划出圆弧。
携着渐行渐暗的余晖,
正在来临的黄昏,
在我温暖却快陨灭的
心中静静地争论。
暮色尽染的森林上空,
橙色的月亮升起,

为什么音乐如此稀少,
四周又这样静谧?
我,一个披挂铁甲的征服者
□古米廖夫
我,一个披挂铁甲的征服者,
我正快乐地那颗星星追缉,
我又穿过一个个深渊和绝谷,
在洋溢欢乐的花园里歇息。
没有星辰的荒漠天空多黯淡!
雾霭升起,但我默然等待着,
我相信,我将找到我的爱情……

我,一个披挂铁甲的征服者。
如果星星连中午也缄默无语,
那我就构筑一个自己的梦乡,
用战歌来关切让它魅力四溢。
我是悬崖和风暴永远的兄弟,
我把山谷之星和淡蓝的百合
镶嵌到威风凛凛的战斗服饰。
——杨开显译《钟摆下的歌吟》